

文化教育的開創者田培林傳略—— 兼論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張德銳

臺北市立大學、輔仁大學退休教授

一、前言

田培林先生（1893-1975）生於苦難的中國，及長學有所成，一生為我國的教育無私地奉獻與付出，被譽為「中國文化教育大師」（周愚文，1992）、「老師的老師」（歐陽教、施宜煌，2006），對於我國的教育行政、高等教育以及師資培育等，皆有卓越的貢獻。其言行事蹟，有諸多值得教育界所學習與效法之處。是故，先略述其生平事略，再說明其教育思想，最後再闡述其生平事蹟與學說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二、生平簡述

依據賈馥茗（1976，1985）、周愚文（1992）以及歐陽教、施宜煌（2006）的論述，田培林先生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

（一）生於富厚積善之家，認真求學

先生諱培林，字伯蒼，河南省襄城縣人，生於清光緒19年（1893），正值滿清腐敗，列強割據中國之際，先生一生遂與苦難的中國命運同步。然在此艱苦卓絕之際，更激起其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

先生出生時家道殷實，父樹棠公，經商兼及社會公益，扶危濟困，造福鄉里，受人欽敬。母宋氏，相夫教子，係鄉親所尊重的賢妻良母。

先生幼秉庭訓，先啟蒙於私塾，後進河南襄城「高等小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畢業後考取許州中學堂。中學畢業後，先入民國大學，但因不滿袁士凱將「民國大學」改名為「朝陽大學」（鳳鳴朝陽，有勸進帝位之意），乃負笈北平，轉學北京大學，並於192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

先生大學求學期間，因家境富裕，課餘喜歡吃小館、聽京戲、逛書攤。逛書店，是先生最大的樂趣。偶然也搜集一些小巧的珍玩，也是消遣之一途。買好書、讀好書，培養了先生終身學習的習慣。

先生求學期間躬逢1919年的「五四運動」，該運動對其教育救國的情懷產生深

刻影響。另在北大期間，先生並沒有因為倡導白話文聞名，但亦實際從事白話文的推廣工作，且養成了寫白話文的能力與習慣。

（二）初任教職，展現教學與行政才華

北大畢業後，先生旋即應聘任教於河北保定育德中學。先生初任教職，即表現出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之風範，除了樂於接近學生、輔導學生之外，對於學生國語文能力的提升，尤有顯著的成就。

先生於1921年，為服務鄉梓，返回河南，先後任教於河南省立第一、第二中學、開封男女師範、法政專科學校等校。在河南任教期間，先生於1922年，當選河南全省各級學校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主席。在主席任內，先生展現行政之長才，除力爭以各縣契稅作為教育專款專用之外，亦倡導學術講學風氣並創立《少年河南週刊》，對河南學子新知識的灌輸、新思想的啟發有功。

1928年先生重返北平，陸續任教於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俄文法政專科學校。1932又擔任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授。直至中年負笈德國深造為止，先生於任教國內中等與高等教育已長達15年之久。

（三）中年留學，學而不厭的精神

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後，曾獲得一項出國留學的獎學生，但因為要侍奉雙親而放棄了。直至1935年，太公與太夫人相繼謝世後，才遠赴德國，入柏林大學深造，師事該校校長、德國文化學派大師斯普朗格（E. Spranger, 1882-1963），習得斯氏之思想精髓。先生日後倡導「教育即文化」、「教育的愛」等，皆是受到乃師的影響。留德期間，先生不僅留意理論之學習，對於德國學制以及德國教育行政組織與實務亦頗為留意，企盼能吸取他人之長，以為國用。

（四）讀書報國，戮力對日抗戰期間的政教工作

1939年先生榮獲哲學博士，隨即返國服務。此時日寇已侵華二載，神州沈淪，烽火遍野。先生以書生救國之志，先後擔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國立同濟大學教授、國立河南大學校長、西北農學院院長等職，在日軍日以繼夜的轟炸中，弦歌不絕於烽火之中。

另先生基於愛國的義憤而出任黨政工作。1941年以學人身分應邀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訓練處處長、第六屆中央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二屆中央幹事等職。其間又當選國民參政員，對時政多所建言。1946年，抗戰勝利返都南京後，擔任教

育部常務次長。處理行政工作，先生為人耿介剛直，處事明快果決，對於不合理的事，堅守原則，不假辭色。來臺後，先生深思個性上過於剛直的缺點，故常勉勵從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學生，要「堅守原則，廣結善緣」。

1945 年臺灣光復之初，先生代表當時中央政府來臺視察教育之情形，是當時視察教育情形的最高層級官員，對於臺灣教育的推動，特別是國語的推行，有筆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

(五) 奉獻後半生於臺灣師範大學

1949 年，先生脫離政壇，應聘為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教授。1953 年接任系主任。1955 年，該校奉准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先生受聘主持教育學院，旋開創教育研究所，極力培植教育研究的人才。教育研究所的畢業生，多數在國內大學任教；出國深造，得到高級學位之後，又回國任教，並從事教育研究的人頗多，是先生晚年頗引以為慰的事。先生作育英才無數，對臺灣教育界的影響深遠，例如臺灣教育先進如賈馥茗先生、伍振鷺先生、郭為藩先生、林清江先生、歐陽教先生、黃光雄先生等，皆為田培林先生所栽培的教育界菁英。

先生除重視學生研究能力的提升之外，亦頗重視教師學位的取得與研究能力的提升。先生致力於開啟教授進修的途徑，因而師範大學講師獲得亞洲基金會出國深造者頗多。另促進中山獎學金基金會增設教育學門。至國科會成立，師大教授得到研究補助或出國進修者歷年皆不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係先生任教最長的學校，可以說是先生把後半生皆奉獻給該校以及臺灣教育的發展，先生在該校任教 22 年，直至 1971 年申請退休。退休後，關心教育如故，閱讀新出版教育及哲學期刊，兼及各種新知識，從未間斷。

先生退休後，時值我國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國事多艱之際，先生於憂國憂民情懷中，於 1975 年 5 月 9 日病逝於臺北臺大醫院，享年八十有三。遺囑：「不開治喪會，不發訃，不公祭，不受賻，不請褒飾。」其耿介情操，可見一斑。

三、教育學說

周愚文（1992）指出，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主要可分成「哲學路線」、「教育與文化」、「教育史」等三部份。在哲學路線上，先生一生研究教育，係建基於哲學之上，由哲學出發來分析教育的對象與本質，進而再進一步檢討教育的現象與問題。換句話說，先生在思考邏輯上，是先理論後實務，先把握本質再來批判現象。

在教育與文化上，賈馥茗、林逢祺、洪仁進與葉坤靈（2003）闡明先生的文化整體觀，認為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所創造出來的價值總體。亦即，在人類演進的過程中，在時間的延續以及人類所居留的環境這二個時空因素下，人類以獨有的智慧，製造、發明、並創造，生產了自然界原來沒有的東西，其中有些是物質的，如器物之類，有些是形式的，如文學、藝術和各種典章制度，這些提高了人類的精神，才是文化的主要內容，再加上物質的改進，成為日益進步的文化整體。

周愚文（1992）亦認為先生的中心觀念係教育與文化。沒有文化，固然缺乏教育的內涵（文化材）；沒有教育，文化便無法進步。教育與文化這兩個概念有一種內在的交插、連環，不能分解的關係。「教育即文化」：由教育而使文化綿延不斷，是教育的傳遞的功能；由教育產生文化是教育的創造功能。可見教育在文化發展上的功能。

在教育史的重視上，先生主張治學，除了哲學的角度外，尚須從歷史的角度來剖析問題，方能掌握教育的歷程是一種改變、發展與進步的歷史。先生認為教育研究可分為系統的研究，即教育學，以及歷史的研究，亦即教育史，兩部份總合起來，便係教育科學（周愚文，1992）。

此外，周愚文（1992）指出田培林先生的另一個教育思想便是「教育的愛」。教育的愛至少有二個特點：其一是教育的愛沒有固定的對象，所愛的是全部的學生。其二，教育的愛不計被愛者價值的高低，反而從低價值入手，使其變為具有高價值的。然教育的愛並不同於讓兒童自然發展的愛，而是有目的、有計畫、有方法的愛。

另施宜煌（2013）從師資培育觀、教育制度觀與學校教育觀等三個觀點，來論述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在師資培育方面，師資「教育」不同於「訓練」，更重要的是教師品格的培養，才能使教師成為人師，並以身弘道。此外，教育實習及教師進修也事關教師品質的提升。在教育制度方面，先有學校再形成制度，所以由下而上的變革本是正常的教育現象。另外，建立以自己文化為傳統為基礎的教育制度，才能綿延與發展本國的文化。在學校教育方面，學校不同於社會，學校教育的任務不能只重視「知識教育」，應同時追求的人生的「真」、「善」、「美」。

四、對教師專業的啟示

綜觀田培林先生的事蹟與思想，有許多值得臺灣教育界，特別是老師們學習的地方。首先，對於師資培育機構而言，師資培育機構應加強教育理論的研究，特別是教育哲學以及教育史的研究，才能建構完整的教育學理論體系，並將之有

計畫、有方法地傳授給師資生，並鼓勵師資生在實務情境中，加以有效應用，才能培養出既為「經師」又為「人師」的好老師。

其次，師資培育機構與各級學校應重視教育實習與教師進修的功能，使教育實習發揮「畫龍點睛」的作用，產生理論與實務整合的功能，培養師資生理論與實務兼備的能力，並經由教師進修管道的普及化、進修內涵的提升，讓教師成為能與時俱進的終身學習者。

對於教育行政機關而言，教育行政機關應體認「先有學校再形成制度」的教育史實，所以由下而上的變革是非常值得鼓勵與推動的，而不能一味的實施「由上而下」的改革，如此才能讓學校發揮學校本位管理的功能，而教師也才能發揮教師領導的無限潛能。對於教育行政人員而言，田培林先生的「張公道，辨是非，明賞罰，名覈實」的作事原則是很值得學習的，但是除了堅守原則外，先生亦認為「處世圓融，廣結善緣」也是教育行政人員應有的修為。

對於教師而言，田培林先生的言行與思想有更多的啟發性。首先還是在「教育的愛」，先生不但是教育的愛之倡導者，更是教育的愛之實踐者，其對學生的學業要求是嚴格的，但對學生的生活、就業以及未來的發展是無微不至的照顧與關心的。是故，教師宜對全部的學生之學習進步付出無盡的愛，特別是對價值層次較低的學生，如文化社經地位弱勢的學童，付出更多的心血，才能創造更大的教育價值。但教師的愛不是縱容學生的缺失，而是要有計畫、有系統的導引。

其次，一位經師與人師兼備的好老師，除了要有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基礎外，教育哲學與教育史的基礎也是相當重要的。有了教育哲學的啟迪，教師才能認清教育的本質，而不會受不當教育現象的宰制；有了教育史的薰陶，教師才能鑑往知來，對教育的改變、發展與進步，掌握其關鍵因素。很可惜的，在當前的師資培育課程中，教育史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以致影響現代教師普遍缺乏史學素養，這是令人遺憾的事。

再者，教師的施教，要重視文化傳承與創造的功能，特別是要體認人類的精神，才是文化的主要內容，而物質只是文化的一部份。在教育內容上，不能只偏重人類科技文明的介紹，亦應同等重視人類精神文明的創造。換句話說，應科技與人文並重，才是完整的教育。

教師教導學生，不應只重視知識的傳遞，更應重視知識的生產與創造。另鼓勵學生追求知識的「真」，只是其人生一部份，亦應同等重視品格的「善」與藝術的「美」之提升，才是完美的人生。也換言之，全人教育或者德智德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教育才是國民教育的真正本質與目的。

田培林先生生活到老、學到老以及自我反思的精神與事蹟，也是值得教師學習的。誠如先生之弟子林清江先生的名言：「人生有三寶：終身運動、終身學習、終身反省。」教師如能終身學習，便不會「以過去所學的知識，教導現在的兒童，適應未來的社會」。教師如能終身反思，當能成為一位有智慧、能不斷自我改善的教學實務工作者。

最後，田培林先生一身奉獻教育的精神，也是吾輩們所效法和學習的。綜觀先生一生，早歲即致力於大陸的教育工作，企圖以教育救國，來臺後之後半生仍本諸教育愛奮戰不懈，春風化雨，育才無數。奉獻教育五十餘年，仍不改其志。退休後，仍不斷追求新知及關心國事。死時遺囑力求低調，不求虛名。這種只為別人、不為自己，務實奉獻的精神，確實永垂不朽

五、結語

田培林先生誠為我國文化教育的開創者、師資培育的典範者。在教學上，倡導並力行教育的愛，作育英才，桃李滿天下；在研究上，係我國教育哲學與教育史學的先驅；在服務上，對於我國國民教育、高等教育、師範教育等皆有前瞻而卓著的貢獻。敬對先生的事蹟與思想，表達致高無上的敬意。

參考文獻

- 周愚文（1992）。中國文化教育大師—田培林。載於劉焜輝（主編），**人類航路的燈塔：當代教育思想家**（頁92-109）。臺北市：正中。
- 施宜煌（2013）。田培林的教育思想研究。**大葉大學通識教育學報**，12，15-36。
- 賈馥茗（1976）。田培林先生的教育思想簡述。載於賈馥茗、黃焜輝（主編），**教育論叢**（二）（頁1-46）。臺北市：文景。
- 賈馥茗（1985）。田培林。載於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名人傳《第三冊》**（頁83-100）。臺北市：近代中國。
- 賈馥茗、林逢祺、洪仁進、葉坤靈（2003）。**中西重要教育思想家**。新北市：國立空中大學。
- 歐陽教、施宜煌（2006）。老師的老師—田培林。載於國立教育資料館（主編），**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頁17-36）。臺北市：國立教育資料館。